

中国共产党历史 学习资料选编

第一辑 下

辽宁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一九七八年·沈阳

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

一、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①一九二七年的秋收起义，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武装镇压了革命，我党吸取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以后，在毛主席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思想指引下爆发的。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在这次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期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正确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基础，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在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革命武装，训练了大批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工农群众砸碎了旧社会的枷锁，从社会的最底层英勇冲杀出来，特别是亿万农民，他们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使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到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全国加入工会的工人达到二百八十万，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达到一千零二十八万，湘鄂赣粤等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等群众革命武装也有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湖南，运动发展得更为迅猛，其中部和南部许多县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管和夺取团防局的枪枝，每县组织了数百人至上千人的农民自卫军常备队，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抗，巩固了农村革命政权，为农民运动向纵深发展，解决土地问题和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到四、五月间、湖南不少地区在农会领导下，逐级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旋转乾坤的革命伟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革命的烈猛发展，引起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抗。地主资产阶级和混入革命内部的国民党右派，咒骂农民运动是“隋农运动”、“痞子运动”，在城市中大造“工农运动过火”的反革命舆论，并借此攻击共产党。窃据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被其势汹汹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不但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而且跟在反动派的屁股后头指责工农运动“过火”，极力压制群众运动，特别是压制农民运动。他们想用妥协退让的政策，求得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团结”，结果是共产党越让步，反动力量越上升，革命群众力量越受到阻碍和损失。国民党蒋介石正是利用了这个弱点，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策划帮助下，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接着，李济深在广东，许克祥在长沙相继发动了“四·一五”和“五·二一”反革命政变，七月十五日，武汉的汪精卫国民政府公开与南

京的蒋介石合流，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分裂而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这样在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党内投降主义者的出卖下遭到了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招致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野蛮的大屠杀。据极不完全统计：“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和逮捕了八百多名革命者，失踪的有五千一百多人；“四·一五”李济深在广州逮捕和屠杀了二千一百多人；长沙和附近各县从五月二十一日到六月十八日短短的二十天内，被许克祥杀害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就不下两万人，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屠杀；仅湖南一省，从一九二七年五月至十月就被杀害了十万多人，全国被杀害的有四十万多人，工农革命机关全被捣毁，革命组织摧毁殆尽，五万七千九百多共产党员锐减到不足一万人。“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①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十分惨痛的，主要是陈独秀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自动地放弃了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②有军则有权，人民有了革命武装才有发言权，领导权和政权，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②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因此，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注重建立革命武装，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特别赞扬农民武装中的梭镖队“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但陈独秀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反对我党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装。早在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党派周恩来同志带领一批党员，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在北军阀中建立了党的工作，但是，陈独秀却胡说共产党员不要在军队中当军官，当了军官就会变成军阀，因此，使党没有努力去扩大自己的队伍，在北伐军中只掌握了很小一支军队，陈独秀完全不懂得我们共产党人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①这个兵权是非争不可的，后来当农民武装兴起的时候，陈独秀又规定了四个不许：不许超出自卫的范围；不许有常备的组织；不许用自卫军的名义；不许注重军事训练，一句话，不许农民有自己的武装。在长沙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郭亮、柳直荀等同志组织十万武装起来的农民围攻长沙的时候，陈独秀斥为“小孩子的把戏”，强令解散了，当汪精卫明目张胆地在武汉准备“分共”叛变革命时，陈独秀不但不加强工人武装，以对付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反而伙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把枪枝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结果在汪精卫实行反革命大屠杀时，革命人民手无寸铁，遭到惨重的牺牲。从“四·一二”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到“七一五”短短的三个月内，千千万万的革命同志牺牲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人民已经争取到的权力，统统丧失干净，这个血的教训使我党清楚地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①于是，有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②从而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准备好了条件。

二、“八七”会议的号角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屈服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取消革命斗争，还是拿起武器，继续战斗。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者，只看到敌人凶恶强大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它内部矛盾重重和反共反人民的虚弱本质；只看到革命力量的削弱，而没有看到革命在群众中的深刻影响，没有看到革命的领导与骨干力量锻炼得更加坚强。因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已经建立并将巩固它的统治，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取消革命斗争，在蒋介石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等待将来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以后，再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一伙由此走上了与托洛茨基匪帮结合进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道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党坚决地把陈独秀开除出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和失败的教训，看到了革命高潮必将重新到来的光明前途。因而，在凶恶强大的敌人面前，表现了伟大的英雄气概，他们“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由周恩来同志和张太雷同志等五人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工作，决定了以下几项重要任务：召集中央紧急会议以解决路线问题；制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派周恩来同志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赴南昌组织军队进行武装起义。八月一日凌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和刘伯承等同志，领导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北伐军部队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消灭敌军三个师，缴枪万余枝，胜利地占领了南昌，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并颁布了革命政纲。但是，起义的领导机关对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认识不足，因而没有向农村进军，与湘赣一带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南下广东，想重新占领广州，取得外援，进行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果，起义部队在途中被优势的敌军打败而散失，只有朱德同志的一小部分兵力，被保存下来，，转战于湘粤边境。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可贵的第一枪，是我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力量向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因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节日，它宣告了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一面坚持革命斗争的鲜艳红旗。

在这革命的转折关头，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国共产党中央不顾严重的白色恐怖，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次会议。到会的还有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苏兆微等，共计中央委员十二人和后补中央委员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三人，地方党代表二人和军委代表一人。 “八七”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纠正党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制定新的路线，确定今后工作方针和对各种问题的 决 议 案；改组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首先，他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自动放弃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严重错误，他形象地把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比作一座空房子，等人去住，但陈独秀始终没有当房子的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他强调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当革命统一战线的主人。第二，毛泽东同志根据他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所看到的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伟力和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强烈要求，指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陈独秀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农民革命，实在有反革命的嫌疑，他还强调指出，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极大的问题，必须没收地主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第三，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次大革命的失败，完全是由于陈独秀不抓军队，放弃武装斗争。他用孙中山重视军事运动和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历史事实，教育大家要非常注意军事，强调指出，这次组织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彻底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通过了关于今后党的工作的许多重要决议，制定了新的策略路线，规定了以武装暴动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

决议案》指出：“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应当坚决地准备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实行烈猛的革命战争”。《最近农民斗争之决议案》提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的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根据这个决议制定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开展土地革命是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最重要的过程”，而组织这次秋收暴动则“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的新阶段”。“暴动大纲”明确规定革命影响最深，群众条件最好的湘鄂赣粤四省是秋收起义的发动地区，并提出秋收起义的战略是“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一同实行暴动、“夺取乡村政权”，“于可能范围内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农民、小商人等革命阶级，组织革命委员会，向反革命势力进攻。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在革命危急关头，它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号召全党 and 人民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特别是决定举行秋收起义，使革命战争和农民运动结合在一起，由此找到了革命的出路，展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也有一些缺点，首先是，这次会议“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其次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

防止“左”倾情绪的滋长，以致后来被瞿秋白发展成为“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这些缺点，也表现在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中，它没有认识到当时的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因而要求在广大地区组织农民的总暴动，不注意有重点选择起义地点，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表现了一定的急躁和冒险情绪。对军事问题仍然认识不足，对于秋收起义的军事准备问题没有着重研究和周密布置，不了解“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①“八七”会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只提出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只实行减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彻底性，这些缺点都被毛泽东同志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纠正了。

“八七”会议在清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以后，撤销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选出了由正式委员九人和候补委员七人组成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受党中央委托负责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

三、制定秋收起义计划

八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偕同杨开慧等同志，通过党的秘密关系，由武昌搭乘货车星夜赶来湖南。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捕，毛泽东同志提前下了车，安全抵达长沙。这时候的长沙，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野蛮屠杀，还在继续进行，反革命鹰犬遍布城乡，到处搜捕革命者。我党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①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在毛泽东同志到达长沙以前，湖南省委由于执行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对土地问题又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甚至还只是政治的没收。因此，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进行了改组。新省委由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同志等九人组成。改组的结果，在毛泽东同志到达长沙后，即向他作了汇报，并在征得他的同意后呈报中央。毛泽东同志住在长沙北门外福寿桥沈家大屋，为了领导新省委组织好秋收起义，日夜紧张地工作着，出席会议，起草文稿，个别谈话，派人外出搞枪枝弹药，吃饭时也在思考问题，甚至忘记了自己已经吃了几碗饭了。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有时提着篮子装着买菜的，或者扮成军官，亲自到市内进行调查。但他对周围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特别关心，不时打听外出同志的情况，唯恐他们遭到不必要的牺牲。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沈家大屋召开了新省委会议，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同志传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新政策新精神，使到会同志受到很大鼓舞。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为组织和发动秋收起义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关于起义中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错误主张。一种是反对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认为中国小地主占整个地主阶级的多数，如果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必定与大地主团结起来，站到反革命方面去，增加了敌人，对革命不利。因此，主张对地主土地只能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土地国有化的时期，必须

没收一切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统一分配和使用。否则，农民将不满足，因而共产党就会脱离广大农民群众。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了上述两种错误主张。在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上。他强调指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要想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对于被没收土地的地主，须有适当的安排，给以生活出路。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我们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由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去执行。还强调在解决农民土地过程中，必须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这就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秋收起义作了重要的政治准备。

关于起义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思想，他透彻地分析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关系，十分明确地指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政权问题，都离不开革命武装，党应当用主要力量抓武装斗争。他认为秋收起义固然必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力量的帮助，没有军事力量作后盾，起义终究要失败。而起义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没有兵力空喊夺取政权，这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以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主要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保卫政权。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党内坚决反对用军事力量作为农民暴动的骨干的机会主义观点。同时，也教育了那些看不清革命武装应当和农民暴动相结合的人。

关于起义的区域问题。会议在第一天开始讨论的时候，大多数主张，湘东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

以常德为中心，在西南之间以宝庆为中心，同时发动全省暴动。党中央当时的意见也是如此。但这种意见是不切合实际的，是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毛泽东同志始终持反对态度。对于这种不顾客观条件，分散使用力重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力主缩小范围，集中力量，搞一个中心，即在湘东赣西发动秋收起义。经过几次讨论，大家认识到要在全省同时发动起义，党的精力和人力、物力都有困难，而湘东赣西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带，群众基础好，并保存部分革命武装。因此，绝大多数同志终于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缩小起义区域的正确主张，决定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地的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

会议还讨论了有关秋收起义的其他重要问题。关于起义中是否用国民党的名义问题，省委不同意中央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秋收起义，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臭了，湖南这次起义应当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关于起义中建立政权问题，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次起义应竭力宣传和建立工农政权，恢复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归农协，县以上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组织政府。关于起义的领导机关，会议讨论决定，湖南指挥暴动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关于起义的宣传问题，省委拟定了对农民的宣传大纲，热情地赞扬了农民的革命行动，揭露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活动，阐明了秋收起义的意义和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响亮的暴动口号。对于起义的军事行动计划，省委曾作了大略的讨论和部署：决定九月九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十一日各县起义，十六日长沙暴动。

四、组织工农革命军

八月三十日，省委会议结束。当晚，毛泽东同志肩负着在湘东赣西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军的重任，从长沙出发了。他身着旧青布工人服装，乘火车到达株洲。第二天，通过安源煤矿株洲转运局的共产党员，找到株洲镇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会议的秋收暴动计划。在听取了有关株洲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把镇内的工人和近郊的农民发动起来，夺取团防局的枪枝，炸毁长沙与株洲间的易家湾铁路桥，防止敌人从长沙方向进攻。随后，毛泽东同志离开株洲，风尘仆仆的前往江西安源，去组织秋收起义的军事骨干力量——工农革命军。

当时，我们党所领导的湘东赣西的工农武装，主要集中在修水、铜鼓和安源三个地方。

驻修水的部队，主要是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警卫团的基础，是北伐时我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后来招收了一批新兵，其中不少是安源工人和湖南湖北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这个团的指战员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长卢德铭同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生、共产党员，在叶挺同志部下当过排长、连长和营长。他对党忠诚、作战英勇，和士兵的关系很好。八月二日深夜，卢德铭同志接到两个电报：一个来自南昌，告知我党已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一个来自九江，张发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命令警卫团速抵九江待命。他立即与参谋长、指导员（当时都是共产党员）秘商，大家认为警卫团虽是张发奎部下，但自己是共产党员，警卫团是党掌握的武装，应该服从党的需要把部队带往南昌，而不去九江。于是决定乘船顺

长江东下，到湖北阳新县境登岸，走旱路赴南昌。八月四日，警卫团指战员乘一艘大轮船，驶离武汉。在黄颡口登陆后，经阳新县城，八月九日到达江西武宁，后来跨过九宫山脉经靖安抵南昌附近的奉新县城时，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撤出南昌向南行进了。卢德铭同志认为追赶不及，放弃了与大军会合的意图，决定自己和参谋长、指导员去党中央请示，将部队交给营长余洒度（当时是党员、后来叛变）带领，折向西进，到湘鄂赣边境“三不管”的修水去休整。

当警卫团西行至武宁时，路迁余贲民同志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原来，平江和浏阳的工农义勇队在大革命失败后，仍然紧握手中枪，继续坚持战斗。党中央决定将他们合编为独立团，由苏先骏（当时是党员，后叛变）任团长，归贺龙同志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管辖，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平浏两部在平江龙门汇合后，经修水、武宁，于八月五日进入涂家埠时，发现张发奎部已先到达，不能通过。于是，浏阳工农义勇队决定南下，设法与南昌起义部队汇合，而平江工农义勇队则决定返回平江，坚持斗争。当 they 与警卫团相迁后，两部决定合兵一处，进入平江的邻县修水待命，并迅即派人与浏阳工农义勇队联系。八月中旬，警卫团和平江农军进驻修水县城。

这时，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一百余人，也开到了修水县境。他们曾在缴获通城团防局五六十条枪后，受命去参加南昌起义。在通城东乡的麦市、与敌军激战、冲散一部分，余部进入修水的桃树港。警卫团知道他们是革命队伍后，派部队把他们接至县城，单独编一个连，罗荣桓同志就在这个连做政治工作。

浏阳工农义勇队退出涂家埠后，酷暑行军，一心想与南

昌起义大部队会合。当他们经过安义、阳新、到达高安时，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已行抵福建边境，无法联系，又得知平江农军与警卫团将进驻修水，便决定经上高等地进驻与浏阳、修水毗连的铜鼓。虽然如此，但是，这时已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今后的革命工作，究竟如何进行，缺乏明确方向。行至上高，随军行动的浏阳县委书记潘新源同志提出，他只身去安源，设法与省委联系，部队继续向铜鼓进行。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八月三十日浏阳农军抵达铜鼓县城。

工农武装进驻修、铜后，一面打跑地主武装，营救革命同志；一面进行政治教育，出操练兵，提高战斗力。当地群众和附近几县的农民非常高兴。平、浏农民吃尽了大革命失败后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苦头，现在他们经常派出代表去修、铜慰问亲人，用红纸包猪肉送给部队吃。有个地方的农民跑到团总家里对他说：“我们的梭标是有数目的，请你好保存，我们又要办自卫军了。”吓得那团总面如土色。修水四乡的农民，在驻城部队一个连的支援下，消灭了大土豪劣绅曹祖烈豢养的靖卫团，活捉“曹老虎”游乡示众，开枪毙了这个血债累累的家伙，将他家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八月下旬，驻修、铜两部的领导人，在两县边界的山口举行会议。为了取得休整机会，等待党的指示，会议决定在“受编不受调”的条件下，派人与江西当局联系，表示愿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并确定以警卫团为主，加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一部分为第一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主，加平江工农义勇队一部分为第三团，同时从警卫团抽调少数同志去第三团工作。余洒度为师长，余贻民同志为副师长，师部设在修水县城。

当时集中在安源的工农武装，主要是安源工人纠察队和

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安源是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党初期所开拓的湘赣两省工人运动的策源地。这里有一支由我党直接培育起来的六百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再有，从一九二五年起，安源的党组织就陆续派遣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打入资本家镇压工人的矿警队内部，进行秘密工作，并逐步地掌握了矿警队。醴陵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在“马日事变”后，参加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后因陈独秀的破坏而被迫退回时，约有一二百人由县委书记罗学瓚同志率领，迳直来到安源，在矿工们的掩护下，重整力量，等待时机。这年七八月间，衡山农军一百余人，在反动军队的残酷镇压下，他们扛起武器，长途跋涉，来到安源待命。萍乡农军在参加十万农军围攻长沙撤回后，又遭到反动派的进攻，撤到安福，与王新亚同志领导的安福农军汇合，九月初，奉命回萍乡。这时，安福和莲花的农军，也一起来到了安源。

总计集中在修水、铜鼓和安源的由我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约有四千余人，两千多支步枪，还有几挺机关枪，此外就是梭标、乌铳、马刀等武器，以及安源工人自己制造的土炸弹（工人们叫它“洋礮古”）

当时的敌军，除各县所属的地主武装外，在湘东铁路沿线和平、浏、醴一带，有敌八军一师师长张国威部一千五百人，罗定匪部一个团，以及驻萍乡敌军一个团，共计近五千人，三千多支枪。

毛泽东同志到达安源后，首先在张家湾召集潘心源等同志开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报告了湖南省委改组的情况以及新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并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我们共产党人要独立地领导人民群